

# 關於抗戰期間國共兩黨關係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問題

楊奎松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

在中國歷史的敘述中，國人當今最容易陷入困惑的，大概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了；而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敘述中，華人自己認識上歧異度最大的，應該就是抗日戰爭的歷史了；在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當中，世人的看法最為矛盾甚至於對立的，無疑就是戰時國共關係的歷史了。兩黨領袖被妖魔化，圍繞著兩黨關係及其歷史作用問題的爭論多半不出當年兩黨政治攻訐戰的揭醜範圍，止步於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至今在多數網民中，包括在部分學者中，仍舊頗為流行。說抗日戰爭期間國共關係問題的研究，甚至於整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充斥著黨派政治的思維邏輯和立場情感，深陷於道德史觀的窠臼中，應該算不上是誇大其辭的奇談怪論。

按照米德（Rana Mitter）的解讀，當今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中所以會充斥著種種極端對立的矛盾說法，很大程度上正與這場戰爭有關。因為，正是這場戰爭的爆發迫使蔣介石國民黨不得不改變對他的對手毛澤東共產黨的關係。然而，八年後當這場戰爭結束時，蔣介石所代表的舊秩序和舊勢力反而被主張另立新中國的毛澤東趕去了臺灣。在他看來，今天有關抗日戰爭的各種旨在抹黑或遮蔽對方的歷史敘述，就是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政治變動的一種後果。

由黨派鬥爭發酵而成的對立歷史敘述，只能在黨派政治的對立氛圍自然消解，衝突雙方逐漸淡化對抗情感，忘卻歷史恩怨，大

家重新融合時，才有可能真正得以改變。否則的話，時人要想改變這樣一種原本就是受政治對立影響而變得對立起來的歷史敘述，就是一件很少可能的事情。

當然，「很少可能」不等於完全沒有可能。去年米德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一書所以會引起海峽兩岸，包括海外華人學界的重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存在於華人中間的這類情感和立場的糾葛，比較客觀地展現了這場戰爭中不同階層中國人的內心感受和他們心理及其觀念的變化。米德能做到這一點，和他是一個外國學者，情感、立場容易超然於外有關。但是，不要說今天不少華人歷史學者已經入籍他國，未必都會受兩岸政治歷史對立的情感左右，即使在兩岸範圍內，當今的歷史學者許多也已經跳出了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範疇，開始著眼於具有普世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及其構成社會、文化主體的人的歷史狀態和存在意義的考察與研究了。在大量基於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眾多歷史學者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超越了傳統的國家、民族、政黨觀念的情況下，很難說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就一定走不出黨派鬥爭思維的死胡同。

## （二）

摒除黨派政治和黨派鬥爭思維看歷史，並不必須要依賴社會學、人類學之類的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原本就對研究者有秉持客觀性的基本要求。歷史學者要想秉持研究的客觀性，一個重要關鍵就要能夠對歷史做「同情之理解」。

何謂「同情之理解」？陳寅恪的說法較形象。他指出：研究歷史者要想對歷史有「真瞭解」，「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萬不可「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對此需要稍加補充說明的是，今天研究中日戰爭者，特別是研究國共關係歷史者，未必缺乏這種「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問題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往往只把同情投諸於與自己情感立場觀念一致的一方，而不善於或不能夠對那些與自己情感立場觀念不同的一方也「表一種同情」。這種片面之同情，與陳寅恪所主張的，仍有極大的距離。

歷史中凡涉及雙方或多方的事件，一定是歷史當事雙方或各方交際、碰撞的各種複雜關係作用的結果。單方的、片斷的所謂史實還原，對重建歷史真實不僅起不到多大作用，有時還會成為扭曲歷史真實的助力。當今圍繞著戰時國共關係問題的對立敘述，許多就是這種片面之同情造成的。故就抗日戰爭史和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史的研究而言，基於客觀中立立場，對當事各方做「同情之理解」，就格外重要。換言之，只有不僅對國民黨抱以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對共產

黨也抱以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不僅對國民黨、共產黨抱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對地方實力派以及各種中間派也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態度；不僅對抗日的中國人抱以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對妥協的中國人也抱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不僅對中國一方能如此之研究，對作為侵略一方的日本人也能如此之研究，對這場戰爭以及戰爭中各種事件的研究才可能真正逼近歷史真實。

秉持對抗戰各方「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還有一個對歷史研究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避免那種「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的後見之明。因為歷史總是漸進的和變化的，人們的觀念、意識，以至知識，也註定只能處在一種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並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在不同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下，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都可能會有所不同。任何一個人、一個黨、一族群，或是一國家，都只存在於某種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條件之中，歷史中人的知識、觀念、行為方式乃至於資訊獲得的能力，對問題的認識與主張等等，與後來時代中人相比，必定是有差異的。同一時代之人，也一樣會因生存環境、條件及所受薰染不同，或因成長經歷各異等等，生成不同的群體，包括具有各不相同的價值取向或政治取向。甚至於同一人、同一群、同一黨，也會經歷由懵懂少知到精學猛進，再到而立乃至不惑的成長過程，由於知

識程度、環境條件，或地位身份改變，其觀念主張及政治目標亦不免會發生改變。拿後來人的知識、觀點或道德標準來批評前人固不可取，看不到歷史中人成長過程中的改變和其內在追求的本質與邏輯，一樣不合歷史研究應有的要求。

### （三）

客觀考察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還需要摒除道德史觀的認識方法。道德自古以來就是號稱正統的史家們用來詮釋歷史的主要因素，但是，隨著進化論彌合了科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鴻溝，二十世紀後的歷史學更強調研究的問題意識，相信必須把歷史中的人放到流動的時間長河中去考察和理解，主張從每個人類群體過去的行為、事件、趨勢或衝突中去查找導致其發生發展的原因。事實上，道德批判式的歷史研究方法，特別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國共兩黨的領袖，絲毫無助於對歷史的「真瞭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悖論就是：如果蔣介石或毛澤東真的如幾十年來許多史書描畫的那樣醜陋、自私、陰險兇殘的話，那麼大批追隨他們的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幹部必然都是一些昏庸無能之輩，那些在兩黨中間選邊站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也一定是些毫無理想追求的食利之徒。然而，無論從國民黨方面來看，還是從共產黨方面來看，這都是不可能的。

道德批判之所以容易流行，很大程度上是比較容易引起那些對歷史的時間性缺少

知識者的共鳴。比如，在抗日戰爭問題上人們對蔣介石的指責中最常提到的一個話題，就是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蔣在東北問題上的曖昧態度。正如有學者概括的那樣，「對如何解決東北問題，蔣介石有一個漫長的搖擺、矛盾、反覆的過程。」問題是，蔣為何會在東北問題上長期搖擺、矛盾、反覆，是「陰謀賣國」，是「腳踩兩隻船」，還是另有原因？要歷史地回答這樣的問題，不從晚清孫中山革命黨的民族革命觀念及主張講起，不瞭解民初以來中華民國建國的曲折過程，是講不清楚的。

同樣的情況，如果說不講清楚從孫中山到蔣介石的「滿蒙政策」歷史變化的經過，就講不清楚蔣介石在東北問題上態度搖擺的原由，那麼，對於毛澤東飽受譴責的所謂「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以及「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之類的傳說，同樣也要從中共政策方針變動經過的時間角度來做考察，並且要瞭解對照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中央政府當年關係的複雜狀況，尤其還要能瞭解共產黨人的階級鬥爭觀念和理想訴求的本質，才能辨析其真偽是非；也才有可能弄清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什麼時候是這樣的主張，什麼時候變成了那樣的主張，以及為什麼毛的思想主張會發生這樣和那樣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內在的主線和邏輯是怎樣的等等。

坦率地說，自從 19 世紀末孫中山領導

革命黨向代表著古代中國正統的清王朝宣戰以來，整整半個世紀中國大陸始終處在革命與戰爭的動盪時期。在革命黨基於西方民族國家理念重建中國的過程中，「君權天授」的正統觀變成了「公權民授」的革命觀，任何號稱革命的政黨都可以代表民意謀求政權；傳統中國的版圖也伴隨著各種號稱代表民意的割據、自治，乃至另立新國的行動，一再遭到割裂。即使國民黨一度取得了中央政權，費時十年逐漸統一了中國本部，卻又被日本的侵略打斷了其立國、建國的進程。革命當道，造反有理，抗戰期間一旦國民黨遭受重創，中共再揭革命之旗，也就不可避免了。

#### （四）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政治道德觀念及價值標準之混亂，實與那個革命建國年代存在太多的道路選擇有關。

自二十世紀初開啟的現代中國的建國進程，從一開始就受到西方多種政治思潮的強烈影響。面對十九世紀末滿清帝國陷入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最先開始傳入中國的不是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反而是自由、民主及法制觀念。影響到晚清的許多仕官和舉人熱心於變法維新，謀求引進西方憲政體制，在中國實行發達如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

1898 年康、梁變法維新失敗後，孫中山等海外革命黨迅速興起，他們所促成的西方思想傳播則變成了民族主義。而這個時候

馬志尼式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主張，對南歐、東歐民族國家的形成影響巨大。面對中國當時民族危亡的險惡處境，和漢族長期受到滿族統治壓迫，久有「反清復明（國）」之志，因而也就有了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的中國式的民族革命運動。這一運動一經發動，即洶湧澎湃，不可一世，輕易地引發了辛亥革命，促成了漢族統治的中華民國的建立。

但是，就在西方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相繼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同時，19世紀下半期在歐洲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強烈地刺激了正在謀求另建新國、再創輝煌的中國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立志要以社會主義立國的革命家，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夕他在比利時第二國際總部發表的關於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聲明，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這種全新的國家發展方向對中國的革命黨人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一種實踐、一種運動，純粹是毗鄰的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的刺激造成的。1919年前後「五四」運動明顯地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面對歐洲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社會動盪，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殘酷現實，許多知識青年都在尋找改造社會、改造中國的最佳途徑。俄國布爾什維克和第三國際向中國輸出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效地成就了激進青年知識分子和底層工

農之間的聯絡與結合。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注意到西方三種政治思潮在中國作用的結果：從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始，直至胡適、張君勱等大批留美、留歐的高級知識分子，形成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群體；以孫中山為代表，包括由眾多華僑和中等知識分子組成的國民黨，形成了中國激進民族主義的政治群體；以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主要由青年學生和中小學教師為主組成的共產黨，形成了中國以實現社會平均為理想訴求的政治群體。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著廣大的處於自然經濟狀態的傳統農村，存在著數量龐大的地主士紳和農民群體，存在著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強大的傳統社會精英勢力。

不難看出，革命所以會在中國此起彼伏，現代中國所以遲遲不能實現統一與獨立，除了列強各國，特別是日本的侵擾外，受到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的各種力量之間，以及它們與中國傳統的社會統治勢力之間的矛盾衝突之難以調和，是一個重要關鍵。而越是革命，也就越要訴諸於武力；而解決這種矛盾衝突的唯一辦法，自孫中山以來，就非靠槍桿子不可。問題是，中國的革命黨從來都只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地逐漸發展成長。這中間一是非借助於外力不可，一是非有效統合、動員組織內乃至國內各種力量為己所用不可。在這方面，最先取得成功的是國民黨。問題是，國民黨隨後竟又敗給了共

產黨。很顯然，曾經一度取得了中央政府地位，統一了中國本部，得到了自由主義政治群體和相當部分傳統社會精英勢力擁護的國民黨，最後會敗給共產黨，和日本的侵略有關。但是，國民黨內外政策及其社會動員力之嚴重不足，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研究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兩黨內外政策及其效果，特別是社會政策及其民眾動員效力的考察，顯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 出版資訊



###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一至六冊)

主編：呂芳上  
執行編輯：何智霖等  
2014年12月初版  
精裝 4,000元

本書利用《蔣中正日記》、《蔣中正總統文物》等相關檔案資料，呈現譜主蔣中正一生事蹟。其體例採綱目體，以一條綱目為一事，綱對該事作提要，目再對該事作簡述，並於編年體架構下，兼採記事本末，使讀者略為明晰事件之來龍去脈，以為後人編纂完整年譜或傳記作張本。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291)